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初级阶段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初级阶段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九卷 初级阶段

主 编：朱新义 马玉涛

副主编：郑珍平 张国华

编 者：付立文 魏良平 王岩岩 张贺男 徐云龙
李 风 白秀峰 回春波 李康恩 郑景利
张洪岩 于国辉 韩智泉 赵永吉 万 昌
刘艳芳 魏良波 刘洋洋 于丽娜 杨彩琴
高 丹 张云丽 邢大勇 廖冬生 徐 雷
刘绍兵 张永刚 宋井刚 龙仲举 杨 铭
李玉田 周 巍 尹维君 程仲海 高 峰
张英杰 姜宝纯 张国琪 徐清吉 裴树元
刘贵国 缪绍训 许贵伟 朱 东 李树蓁兵
王春谊 高思源 刘立山 杨 峰 冀彭学
张 扬 陈跃和 姜延森 陈加强 孙海燕
周晓光 闫家泽 刘玉明 马成义 王金刚
许成顺

统 稿：何成艰 张占斌

目 录

第一章 徘徊中前进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举的国内形势	(001)
揭批“四人帮” 清查工作艰难展开	(006)
邓小平复出 主持开展中央工作	(010)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016)
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取得缓慢进展	(020)
经济的初步恢复和各项工作的展开	(026)
十一大的召开仍然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032)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037)
1978 年召开的科技大会	(045)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两个凡是”方针的批评	(050)
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新的冒进的发生	(056)
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	(06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激烈的争论与全国大讨论	(066)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72)
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与国务院务虚会议的召开	(077)

第二章 历史性转折

邓小平东北之行	(084)
转折时期我国外交政策及周边环境	(088)
转折的前奏：中共中央会议的召开	(093)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099)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	(104)

理论务虚会议的召开	(109)
理论务虚会议的全面的评价	(114)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120)
发展国民经济面临的紧迫问题	(125)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的提出	(130)
新八字方针推进国民经济调整的作用	(135)
调整国民经济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140)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纠正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	(145)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制定	(148)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调整	(15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与修订	(155)
全面开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以彭德怀、刘少奇 为例	(160)
整顿各条战线——文化、教育、国防、科技事业表现活跃	(165)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露曙光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初步发展	(170)
农村改革的提出与酝酿	(175)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	(180)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85)
对外开放决策的酝酿与确立	(190)
沿海经济特区的初创	(195)
中国经济特区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以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为例	(200)
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	(202)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邓小平访美之行	(207)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与邓小平访日	(212)
中英首脑会见 香港问题揭幕	(217)

第四章 改革开放的展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223)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228)
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233)
中共十二大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目标	(238)
中共十二大的重要历史贡献	(244)
选拔接班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产生	(249)
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	(2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制度恢复	(259)
在横向联系中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264)
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270)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2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	(280)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确定全面整党	(286)
全面整党工作的开展及成果	(291)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96)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301)

第五章 开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期

全面改革纲领的提出与制定	(307)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	(313)
“六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319)
科技体制的大范围改革	(325)
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	(331)
民主法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	(336)
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的战略转变	(342)
百万大裁军与军队的“三化”建设	(347)
中国调整对外政策——中美、中日、中苏、中国和 第三世界国家关系	(352)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形成、发展	(358)

“一国两制”构想的初步实践——香港、澳门、台湾	(364)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	(370)
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经济区	(375)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与确定	(380)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进展及意义	(385)

第六章 初级阶段的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九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39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及其探索	(396)
中共十三大开幕	(40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407)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	(412)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确立	(417)
“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	(422)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和初步展开	(427)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和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432)
1989 年政治风波的顺利平息和防止“和平演变”	(437)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	(442)
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447)
价格闯关与经济膨胀风波	(452)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458)
“七五”计划的完成和十年规划“八五”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46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提出、内涵、意义	(469)
科技事业硕果累累	(475)
开发浦东 意义重大	(480)
时代主题的明确与外交工作的进展	(485)
积极发展睦邻友好的关系	(490)

第七章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八九十年代国内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494)
---------------------------	-------

新时期国际环境错综复杂	(497)
治理整顿 深化改革	(499)
南方视察的重要作用	(509)
从中央到地方掀起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热潮	(514)
江泽民在中央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	(520)
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新突破	(525)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534)
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的指导地位	(539)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的出台	(546)
中共十四大的历史贡献	(552)
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产生	(557)
宏观调控方针	(563)
宏观调控方针的具体实施	(568)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573)
努力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579)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进展	(584)
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的全面丰收	(589)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构想	(595)

第八章 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台湾当局挑战统一大业，李登辉抛出两国论	(598)
毫不动摇的反台独	(604)
第一次汪辜会谈	(609)
香港政改方案抛出的前前后后	(614)
彭定康的国际大游说	(620)

第九章 用邓小平理论加强党的建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	(625)
反腐倡廉和推进党的建设	(634)

无锡非法集资案揪出王宝森、陈希同	(639)
学习党的好干部孔繁森	(643)
纪念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	(648)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	(654)
主要参考书目	(659)

粉碎“四人帮”后 百废待举的国内形势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在毛泽东逝世后，密谋篡党夺权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沸腾。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党心、军心、民心，集中党和人民的智慧，精心部署，坚决果敢地同“四人帮”斗争的结果，是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生动体现。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国进入了由“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向纠正“左”倾错误和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转变。“四人帮”被粉碎的初期，百废待举党和国家面临的国内形势是十分复杂而严峻的。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和组织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在许多方面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四人帮”的余党还在全国各地活动着，有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构的权利还掌握在这些余党手里，他们经营多年的帮派体系还没有被摧毁，上下串联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制造事端，以致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还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因此中国共产党内，特别在其领导层，对要不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晚年错误都存在着重大分歧，对今后中国的走向也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政治上，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歪曲和篡改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一系列极“左”口号，到

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颠倒是非、颠倒了敌我关系，倒转了无产阶级专政针对的对象，大开“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不跟着他们走的干部，一律都要打倒。许多开国元勋、老干部、老同志，中共中央的大部分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国家主席、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国务院的副总理、各部的部长、各省的省长、省委书记等几乎都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被打倒了。他们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造谣诬蔑，陷害同志，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一片混乱，是非颠倒，问题成山，冤假错案遍地，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任务极其繁重而艰巨。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①据不完全统计，仅“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就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也有几百万件，而不同程度受到株连的则更多。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为“左”倾错误遗留问题需要处理的还有100万人以上。

在思想理论上，林彪、“四人帮”一伙长期控制着舆论阵地，肆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扰乱是非，搞乱了人民的思想。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盛行，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局面亟待澄清和纠正。他们破坏了理论宣传工作，他们的流毒还在侵蚀着一些人的心灵和肌体，有待批判和肃清。

在经济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许多违背经济规律理论，颠倒是非，使一些生产组织瘫痪，革命队伍分裂，人心涣散。在城市，工厂的生产设备大量损坏，大批工厂停工停产，生产管理混乱，工人们都无心生产。整个国民经济混乱，工业发展的速度受到严重影响，1966年~1973年，平均每年递增11.2%，1974年以后大幅度下降。1974年~1976年，平均每年递增4.9%。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到1976年，出现了各个方面的倒退。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能源短缺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同时，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过大，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6年，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43.7%，与1952年相比下降了20.7%。轻工业的经济水平低，直接影响市场供应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农业方面，党和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制度被破坏，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上下左右齐伸手、四面



八方搜刮农民等现象十分严重。农民负担重了，把一些生产队搞穷了，连简单再生产也很难维持下去。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如钢产量在1974年以来大幅度下降。1976年生产钢2 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倒退了五年。农业劳动力平均的粮食产量，1976年为974公斤，比1975年减少了36公斤。棉花、油料的人均产量比1957年还低。“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使财政收入下降，财政状况恶化，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76年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只有62.8元，比1965年的52.3元增加10.5元，平均每年增加不到1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当多的社员口粮不足，农民生活极其困难，有些地方的农民出外以乞讨为生。城市里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由1965年的625元下降到1976年的604元。由于基础建设规模大、积累率高，城市建设大量欠债，住宅紧张，生活问题成堆。林彪、“四人帮”借搞社会主义而搞假社会主义和推行极左路线，全面破坏党和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组织上，林彪、“四人帮”一方面丧心病狂地从上到下地纠斗那些阻碍他们反革命政策实施的干部，篡夺了一部分权力；另一方面，他们不顾党纪国法，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网罗党羽，安插亲信，将大批跟随其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和打、砸、抢的“三种人”提拔为各级领导干部，甚至还把流氓和贪污盗窃等犯罪分子提拔重用。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统计，1974年以来，公交系统30多个局级单位提拔的正副书记中，没有经过基层酝酿推荐，而直接由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点名、限期突击提拔的就占40%。在几个“双突”搞得比较严重的单位，批林批孔后发展的党员中，有20%左右的党员不符合条件。他们通过“双突”，拼凑帮派体系，自立中心，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四人帮”及重要骨干的经历和地位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非常一般。但是他们完全是在一种特殊关系光环的烘托下，以最革命之名行最反动之实的阴谋手段扶摇而上的。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②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亲信和“三种人”在继续掌权，因而党和国家的各种组织严重不纯，有待组织、整顿和清查，以纯洁组织。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涣散，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以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受严

重破坏。不少党支部垮了，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少党员的党性，党的观念和组织性、纪律性减弱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能很好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害。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竭力要制造一种恐怖，鼓吹“民主”是虚伪的，“法制”是禁锢革命行动的。正如叶剑英在讲话中所言：“林彪、‘四人帮’混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只怕是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实在的民主，因为它只对反抗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对其他所有的人都保障享有空前未有的民主权利。”^③

在科学、教育、文化和艺术等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科教领域是重灾区，受到的破坏更是非常严重。由于林彪、“四人帮”挥舞教育战线“两个估计”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科研、文教机关、学校、群众艺术团体基本上被打散、被砸碎。全国许多科研建筑、实验室、实验器材被毁坏。全国的大学长期停课“闹革命”，中小学校的教室、门窗、大部分被砸烂，“白卷英雄”风行一时，文盲大量涌现。十年“文革”最大的错误之一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使各级领导部门和各行各业出现了断裂层，缺少人才，干部青黄不接。许多优秀的文艺、文学作品被停止演出和出版。文革前古今中外的书籍也被查封和烧毁。九亿人民的中国，只演几个样板戏，唱几支歌，人民的生活极其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科教文化战线批判“业务挂帅”、“白专道路”的帽子满天飞，有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几乎都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打倒在地，人格、名誉扫地，其中不少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精英被迫害致死，含冤九泉之下。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被斗被打，受尽了摧残和折磨。广大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列入另册，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压力都非常大。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全面深入地揭批和清算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分清路线是非，要求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清中国国情和特点，发展生产力，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但是，对于如何认识形势和人民的要求，怎样从“文革”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及国家领导人之间思想不统一，产生分歧。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

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共产党员认为，粉碎“四人帮”后，不但要揭批其反革命集团，而且还要彻底纠正党和毛泽东所犯的“左”倾错误，恢复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领导人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等领导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人民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采取了压制的态度。阻碍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从而形成了新时期头两年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注释：

①②③ 《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8页，第501页，第497~498页。

揭批“四人帮”，清查工作艰难展开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在毛泽东逝世后，密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实施了隔离审查，从而一举摧毁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四人帮”在党内经营了很多年，他们长期控制着舆论阵地，歪曲毛泽东的指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颠倒是非黑白，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极大混乱。揪出“四人帮”这一重大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在党和全国人民中激起一片欢腾。

当时要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走出来，最紧迫的大事就是，在全国开展揭发批评“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的斗争，实现全国安定团结。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指导思想和路线，扭转困难局面，以便迅速开展各条战线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入系统地批判他们的反革命路线和反动的世界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一场全国性的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开始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指出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1976年10月14日，党中央向国内外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20日，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收集他们的罪证材料。专案组下设办公室，由汪东兴负责，并立即开展工作。为领导宣传理论工作，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耿彪为首的由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等组成的“宣传口”，协助中央管理全国的宣传工作。在11月15日至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规定了宣传工作的三个要点：突出宣传华国锋；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彻底揭批“四人帮”。同时对揭批“四人帮”的工作

作了部署：决定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几个揭批战役，逐步深入地进行批判，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为此，中共中央于1976年11月，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揭发批评“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的决定。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中央领导下分为三个阶段，也称三个战役。因为揭批“四人帮”要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要有一个逐步澄清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逐步提高的过程。

第一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清查其帮派体系；第二个战役，着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剥掉其披着的马克思主义外衣；第三个战役，深入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着重揭批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1976年12月10日起分三批下发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以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针对罪证材料，并结合他们在各地区、各部门所犯的实际罪行，投入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揭批斗争。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下简称《材料之一》），首先以大量事实揭露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公布了江青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及陷害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公布了1974年以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及其他一些场合，批评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一些讲话。这些讲话是当时批判“四人帮”的主要思想武器。这些材料一直传达到群众，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为了配合《材料之一》的下达，《人民日报》于12月17日发表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猖狂的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文章中指出：“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前的遗嘱，其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一伪造来推翻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夺取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四人帮”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社论说，“四人帮”全部反革命罪行的要害，“是彻底背叛毛主席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篇社论与1月28日的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引导全国人民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焦点集中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问题上。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要经过“三个战役”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1977年1月

1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乘胜前进》一文。在社论中华主席号召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是我们全年的中心任务。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以下简称《材料之二》），开始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中心的第二个战役。配合《材料之二》的下达，“两报一刊”等重要报刊发表很多批判文章。其中《人民日报》发表中科院理论组的《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一文，驳斥了“四人帮”对《科学院汇报提纲》的诬陷。向群发表的《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驳斥了“四人帮”对《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的批判。这些批判文章剥掉了“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给自己戴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等桂冠，还其反革命的真面目。广大干部和群众结合《材料之二》，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集中知情人提供的证据，向中共中央进一步揭发“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丑恶历史。“四人帮”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表面上标榜自己“最革命”，利用革命领袖的错误煽动极左思潮，同时还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鼓吹个人崇拜，把自己打扮成“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忠实接班人”，欺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实际上，他们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分子。经过第二个战役的揭批斗争，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认识到“四人帮”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本性决定的。

在揭批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1977年7月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全会根据党章的规定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出组织处理。全会对“四人帮”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一致决定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这一决定，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调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以下简称《材料之三》）。《材料之三》揭露了“四人帮”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颠倒敌我关系，炮制高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然而，《材料之三》存在着重大缺陷。它名义上要求揭批“四人帮”的反动